

20世紀

中國科學家口述史

袁隆平

口述自傳

袁隆平 口述

辛業芸 訪問整理

開明書店

序 言

我與袁隆平同志相識，已經快 40 年了。那是我在湖南工作的時候，我們相識的媒介，就是他的雜交水稻研究。如今，他已經是全中國和全世界聞名的科學家了，而我卻垂垂老矣！《袁隆平口述自傳》即將出版，編者要我為該書寫點什麼，我很愉快地接受了這個任務。

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研究，始於 20 世紀 60 年代，那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由於「四人幫」的瘋狂破壞，國家的經濟秩序被徹底攪亂，人民生活非常困苦。湖南本來是一個農業大省，是歷史上有名的魚米之鄉，但那時老百姓的溫飽問題都難以解決。我作為省裏的主要領導人，對老百姓的「吃飯」問題非常憂慮。而且，毛主席當時的「世界革命」的思想，也促使我們了解到全世界的糧食問題的嚴重性。為此，我好像在困難中看到了一個亮點。

中國是傳統的農業大國，如果雜交水稻研究取得成功，那將是對全世界的一個劃時代的貢獻。毛主席對農業的高度重視，鞭策我對這一重大科研課題給予關注。早在 1970 年，袁隆平和他領導的科研小組，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湖南省領導機關（那時中共湖南省委尚未恢復，還是「革委會」時期）就對他們的成果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我和袁隆平曾做過一次愉快的交談。他的坦誠，他的質樸，他的科學思維，他的科學視野，都給我

很深的印象。我告訴他，要將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材料，拿到群眾中去搞，並要求有關地市和部門大力支持。對於科學研究，我是個外行。但我知道，農業生產要發展，就得依靠農業科學的進步；而農業科學的進步，離開農民和土地，是不可能成功的。作為一個地方的領導人，支持和幫助他的科研項目，是我的天職。大概從那時候開始，我們之間就建立了一種友誼。此後，雜交水稻在湖南推廣試驗，取得了成功。湖南的糧食生產，迅速上了一個新台階。1975 年，我已經到北京工作。他們為了將雜交稻向全國推廣，碰到了困難。我聽取了他們的匯報，決定從財政上給予支持，並及時要求南方 13 個省、市立即行動，推廣雜交水稻。後來實踐證明，雜交稻的大面積推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不僅是袁隆平的成功，也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成功。袁隆平就是社會主義中國的一個當代神農！我長期分享着他們勝利的喜悅。

馬克思說：「在科學的道路上，從來沒有平坦大道。只有那些不畏艱險在崎嶇小路上攀登的人，才有可能到達光輝的頂點。」我想：袁隆平就是這樣的人。本書所記述的關於他從事雜交稻研究的詳細過程，以及蘊藏在這一過程中的科學精神和偉大人格，便是明證。

現在，中國正處在一個飛速發展的歷史時期。和世界上先進的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科學技術還有一定的差距。我們需要千萬個袁隆平。袁隆平的奮鬥精神在鼓舞着我們，炎黃子孫應該急起直追。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指日可待！



二〇〇八年十月十八日

目 錄

序 言	ii	湖南水稻大增產 / 發表〈雜交水稻培育的實踐和理論〉 / 獲 1981 年國家技術發明特等獎	
第一章 家世	001		
第二章 學生時代	009		
第三章 安江農校	031		
初為人師 / 餓殍的震撼 / 來自農民的啟發：「施肥不如勤換種」 / 決定性的思考與選擇 / 雜交水稻選育的思路 / 在《科學通報》上發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 結婚成家 / 成立雜交水稻科研小組的前前後後			
第四章 三系配套 協作攻關	079		
到雲南元江去尋找野生稻 / 常德會議成為轉折 / 在海南三亞發現「野敗」 / 一闖三系配套關 / 二闖優勢組合關 / 三闖製種關			
第五章 大推廣 大增產	115		
千軍萬馬下海南 / 開始在全國大面積推廣 /			
		第六章 兩系法雜種優勢利用	131
		成立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 / 雜交水稻發展戰略 / 首屆雜交水稻國際學術討論會 / 中國獨創的「兩系法」	
		第七章 走向世界	153
		「雜交水稻之父」一說之緣起 / 第一項農業專利轉讓給美國及其後的中美合作 / 國際培訓班和國際學術討論會 / <i>Science</i> 介紹超級雜交稻選育理論 / 推廣到全球 20 多個國家	
		第八章 新世紀 新目標	179
		首屆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 持續發展的「中心」 / 超級雜交稻研究 / 三大工程 /	

學科積累與人才培養 / 對「轉基因」的看法 / 改革開放帶來發展變化 / 關注國家和全球的糧食安全問題	
第九章 答問錄	231
科研工作與成功經驗 / 榮譽與感恩 / 生活態度與追求	
第十章 看圖憶事	273
附 錄	305
袁隆平年表	
袁隆平主要著述目錄	
袁隆平寫給母親的信	
參考文獻	324
再版後記	325

第一章 家世

清代雍正年間，從第十一世祖開始，
我們家的族譜排輩的字序是
「大茂昌繁盛，興隆定有期，
敬乘先賢業，常遇聖明時」。
我是「隆」字輩。

宅於縣城北門，取名「頤園」。我小時候從北平回老家住過幾年，就是在頤園。在 1938 年的武漢大會戰中，江西德安成為敵我雙方的必爭之地，袁家在德安的家產大多毀於戰火。不過，在此之前，我已隨父母到了武漢，躲過了這一劫。

曾祖父那一輩因從務農轉到經商，命運有所改變，觀念也隨之改變，開始重視對後代的教育。因此，祖父盛鑒公考中了舉人。廢除科舉制度之後，他又隨時代而變，從舊式的讀書人成為新型的知識分子。在清末籌劃憲政的時期，他曾進入江西地方自治研究所學習。辛亥革命以後，由九江五縣同鄉會公舉，他做了兩年的「知事存記」，大概相當於現在縣政府裏的辦公室主任，再後當選為江西省議會的議員，做過縣裏高等小學的校長，縣農會會長，還曾被委任為廣東文昌縣縣長。但他到海南後，因語言障礙，難以開展工作，就遞交了辭呈。

我父親袁興烈生於 1905 年，原來住在德安縣城北門。他畢業於南京的東南大學，就是後來的國立中央大學和南京大學，畢業後也在縣裏擔任過高等小學的校長和督學。20 世紀 20 年代到 1938 年在平漢鐵路局工作。我父親很有愛國心，在鐵路上做了很多為抗日戰爭運送軍火和戰略物資的工作。在抗戰期間他還曾發動一個企業家捐獻了 500 把大刀，贈送給西北軍的「大刀隊」。可能是因為這個機緣，後來他受到西北軍的愛國將領孫連仲的器重，做了這位上將的祕書。再後於 1947 年底調到南京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任職，做事務科科長。

我母親華靜，原名華國林，是江蘇鎮江人，生於 1902 年。母親有個妹妹，叫華秀林，是協和護士學校畢業的。我外公去

我對我家祖上事情的了解十分有限，只是有位叔叔，曾經整理過一份《西園遷徙》的小資料，對此有很簡要的概括。從中我了解到，袁家中我們這一支脈，在明代的時候落腳在江西德安縣南郊坡上的青竹畝，在那裏世代務農。清代雍正年間，從第十一世祖開始，我們家的族譜排輩的字序是「大茂昌繁盛，興隆定有期，敬承先賢業，常遇聖明時」。我是「隆」字輩。

我的曾祖是「繁」字輩，他有兄弟四人，取三綱五常中的「仁、義、禮、智」排名。我的曾祖父袁繁義排行第二，生於 1840 年，就是爆發鴉片戰爭的那一年。後來在太平軍起義的戰亂中，因偶然的機會，曾祖父弟兄們得到了一筆意外之財——那是押運餉銀的清兵遭遇太平軍的追殺而捨棄的銀錢。幾兄弟從此棄農經商，家道也由此興旺起來。到清光緒己丑年間（1889 年），四兄弟離開了青竹畝，去到德安縣城發展。他們齊心協力，苦心經營，逐漸有些積蓄，於是在縣城裏建起了大約有千餘平方米的住宅，當時在城中就是第一大宅了，被後世稱為「西園袁氏」，算得上是縣中的「望族」。

這個大家族到 20 世紀 20 年代分了家。我祖父袁盛鑒，建

世早，外婆年紀輕輕便守寡了，後來母親就隨外婆寄居在舅公家。舅公叫許忠真，我們小的時候都曾去過舅公家。舅公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我們也都見過。過去我們一度失去了聯繫，20世紀70年代我曾託人去尋找這些親戚的下落，卻如石沉大海找不到。但最近終於有他們的後人寫信過來，我們之間總算又續上了失落已久的親情。現在，我舅公的女兒還在世，叫許金秋，有89歲高齡了。

我母親早年在江蘇鎮江教會學校讀高中，畢業後就在安徽蕪湖教書。在這期間，認識了在南京東南大學讀書的父親，後來他們結了婚。

母親是知書達理、賢惠慈愛的人。她是當時少有的知識女性，我從小就受到她良好的熏陶。我的英語是我母親發蒙的，很小時我就跟着她唸：This is a book. How are you……後來上學，我的英語課從來不複習就都是高分，我覺得很容易，因為我有基礎。母親對我的教育影響了我一輩子，尤其在做人方面，她教導我做一個有道德的人。她總說，你要博愛，要誠實。

我家兄弟姊妹六人¹，在那戰火紛飛的年代，我父親對我們的教育從未有過絲毫的放鬆，不管輾轉到哪裏，都把我們送進學校讀書。我們家自曾祖起，就有一個重視教育的好傳統。我生長在這個家庭中很幸運，是這一傳統的受益者。

我家雖然祖籍是在江西，我自己卻是出生在北平協和醫

院。因為生在北平，便取名「隆平」。當時，我的姨媽華秀林是北京協和醫院的護士長。最近欣然獲得了我在協和醫院的出生證明，並根據協和醫院的記載榮幸得知，我是由林巧稚大夫參與接生的。查了一下林大夫的傳記資料，她生於1902年，和我母親同歲。她1929年6月畢業於協和醫學院，7月成為協和醫院婦產科的第一位女大夫。另外，根據協和醫院的檔案，我出生時，家住西城舊刑部街長安公寓。據北京來的同志告訴我，那個地方應該是位於現在的民族文化宮一帶。後來我們家搬到了東城金魚胡同10號，是現在的王府飯店那一帶。

我很感謝林大夫，感謝協和醫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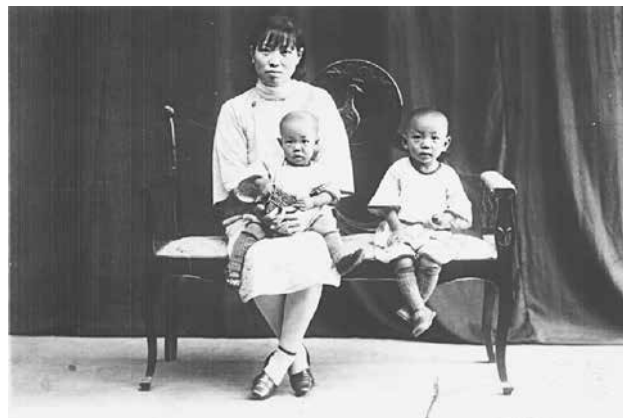
我在兄弟姊妹六人中排行老二，因此小名叫「二毛」。我的幾兄弟名字基本上都是按出生地取的。我哥哥隆津，大我兩歲，是在天津出生的；老三隆贛，給他取名字的時候，我們家已經離開北平而回到江西老家了；四弟隆德於1932年出生於老家德安，算是真正的德安人；五弟隆湘，出生地是湖南的桃源。從我們弟兄取的名字看，反映出一段遷徙的歷史，自我之後算起，可算是在抗戰時期舉家顛沛流離的歷史寫照。

我有個妹妹袁惠芳，是我同父異母之妹。少小時我們全家逃難到了重慶，一起生活了8年時間，讀書、做遊戲，關係很融洽。那時我很喜歡到嘉陵江游泳，惠芳總是跟着我，坐在沙灘上幫我看衣裳，順便揀點漂亮的貝殼、鵝卵石什麼的，非常開心。後來她回了德安，我們曾經很長一段時間失去了聯繫。歲月不饒人，我們重逢時都老了，但她仍是性格開朗，正直、善良，心態很好，很有人緣。

1 袁興烈還曾有過一次婚姻，與劉梅菩生女袁惠芳，為袁隆平同父異母之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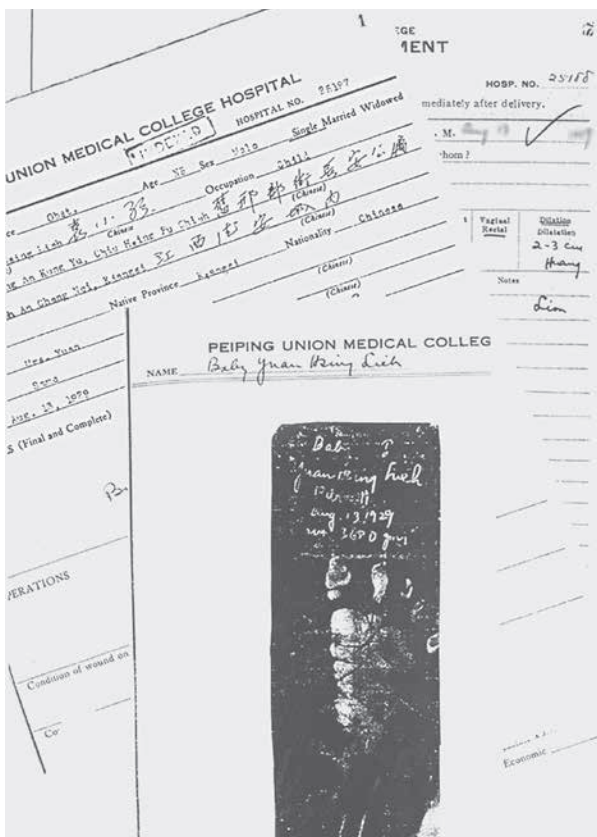
九一八事變，日本侵佔了中國東北。因華北局勢驟然緊張，我母親帶我們南遷，回到老家江西德安躲避了幾年。那時我還很小，記憶中我的祖父是位不苟言笑的老者，我們很怕他，不敢隨便講話，吃飯的時候也是規規矩矩坐着，老老實實地吃。我生性調皮，記得有一次，因為我對祖母那桿可以「咕啾咕啾」冒泡的水煙袋很好奇，趁沒人的時候就拿到嘴裏吸了一口，嗆得我受不了，一撒手，水煙袋掉在地上，摔壞了，祖母拿着煙管來敲我的腦殼。長大一點後，祖父就教我們認字。我有時因為貪玩不用心學，還被打過手心。

因為我游泳游得好，就由我當同學們的教練，教他們游泳。在北碚夏壩的時候，前面是秀麗的嘉陵江，我們經常沿着一溜下到江邊的石階去游泳。有時為了去對岸看電影，我就將衣服頂在頭頂上，游過去了再穿，這樣就省下過渡的幾分錢。



- 1 母親懷抱 1 歲的袁隆平，哥哥隆津坐在旁邊
- 2 袁家故居頤園位於江西省德安縣城北門路東段。圖為頤園故址所遺石墩

1
2



- 3 協和醫院檔案記載着袁隆平出生時的有關情況。左上頁記有「袁小孩」「舊刑部街長安公寓」「Aug,13,1929」；右上頁有林巧稚簽字（Lim）；中為袁隆平出生時留下的腳印

第二章 學生時代

我在學習方面喜歡憑興趣，
從小學到中學直到大學都是這樣：
對喜歡的功課，就特別注意聽講，
還讀這方面的參考書，成績就很好；
不喜歡的，就考60分，
只求及格就行。

必須強大起來。

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就是這樣在動盪的戰爭年代中度過的。然而，父母始終沒有放棄過我們上學讀書的機會。在顛沛流離中，我先後進過三個小學，先是漢口的扶輪小學，然後是湖南澧縣的弘毅小學，後來是重慶的龍門浩中心小學。

在班上，成績最好的是三個女同學，我和玩得好的一位同學黎浩常排名在第四到第十之間。我們一起上學，放學一起回家，在回家的路上經常背誦詩歌，在一塊做遊戲。有時需要出點兒小錢時，只要我口袋裏有，我就願意拿出來請客。

我小時候很貪玩。1939年春，我們一家六口隨父親輾轉湖南等地逃難到了重慶。那時日本飛機經常來轟炸，經常會拉空襲警報，警報一響，我們就不上課了，就要躲到防空洞裏去。但防空洞裏很不舒服，憋悶得很，我們就跑出來，到河邊去游泳。一次我帶上我的弟弟隆德逃學去游泳，被父親用望遠鏡遠遠看見，他氣得提了柺杖就到江灘上來將我倆揪了回去，打了一餐飽的。我以為拉上弟弟，兩個同時犯錯誤，罪責會輕一點，各打50大板。結果哪曉得，逃學游泳不講，還拉上弟弟，罪加一等！結果捱板子狠狠地打了一回。

重慶在抗日戰爭期間是陪都，當時已淪陷或部分淪陷地區的機構和學校，有很多都遷往重慶等大後方，漢口博學中學（後簡稱「博中」）就是遷到重慶的一所學校。我小學畢業後，開始是進入復興初級中學，後轉學到贛江中學。當時我哥哥隆津就在遷到重慶的博中讀高一，他認為博中的教學質量比贛江中學好，極力主張我轉學到博中，於是我又於1943年轉到博

1936年，我們離開德安，跟着父親在漢口住下來，他仍在平漢鐵路局做事。相對來說，這期間度過了一小段平安寧靜的生活。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父親在這段時間就忙於給西北軍運軍火和送大刀。1938年武漢失守，我們全家又開始了逃難之旅，從漢口乘小木船沿水路到達湖南的桃源縣暫避一時。同年10月底，五弟隆湘在此出生。父親原定目的地是逃往湘西的沅陵，因為冬季裏河道水淺，再加上聽說湘西土匪很猖獗，決定改道去重慶。於是便重返洞庭湖，再進長江。這一年除夕，一家人是在停靠於湖北宜昌江邊的小木船上度過的，我們全家深感流離失所之苦。之後再由宜昌乘船到達重慶。

抗戰期間，隨着國土的淪陷，中國許許多多的家庭都有舉家逃難的痛苦經歷，飢餓、疾病、死亡，時刻伴隨在人們的身邊。在桃源的日子裏，我親歷過日本飛機轟炸，親眼看到了火光沖天、屍橫遍野的悲慘景象。一到重慶不久，又經歷了「五三」「五四」的大轟炸，目睹了佈滿江邊沙灘上百具血肉模糊的屍體，一想起來就心裏發緊。不過，這場戰爭也教我從小懂得了一個道理：弱肉強食。要想不受別人欺侮，我們中國

中讀初一。此後，我就一直在博中學習、生活。抗戰勝利之後，1946年我們家遷回到武漢，博中也遷回漢口，我仍然繼續在博中讀書，前後有四年多時間。所以說我的青少年時期大都是在博中度過的，她是我最感親切的母校，她給予我培養和教育，對我的成長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博學中學是英國基督教倫敦會創辦的教會學校。這所學校在重慶的校址坐落在市郊南岸黃角埡背風鋪。校舍十分簡陋，除一棟學生宿舍屬半磚瓦半土牆結構外，其餘房屋都是用竹片敷上黃泥建成的。但這裏是一處風景美麗的山林，四季鳥語花香。博中的姊妹學校懿訓女中也建在這裏，彼此毗鄰，我們經常聽到隨風送來女中唱詩班優雅的歌聲，很令人神往。雖是教會學校，學校裏的宗教活動並不多，信教與否，完全自覺自願。在校四年多，我只參加過兩次宗教活動，一次是在重慶

○ 博學中學 ○

武漢博學中學前身為漢口博學書院（1899—1928年）、私立漢口博學中學（1928—1952年）、武漢市第四中學（1952—2009年），是一所有着110多年悠久歷史的中學。最初的創辦人是英國傳教士楊格非牧師，他於1896年受英國基督教倫敦會派遣，來中國華中地區傳教並辦學；第一屆院長是馬輔仁牧師，屬倫敦會的教會學校。由於學校規定每周有全校師生的禱告和做禮拜時間，因而具有典型的宗教特色。舊址曾在漢口後花樓居巷，後遷至當時名為「漢皋」的新址，即現址武漢市橋口區簡易路。1928年，經由中華基督教會改組，博學書院改名為私立漢口博學中學。抗日戰爭期間，1938年曾遷至四川江津縣，1940年又搬遷至重慶南岸背風鋪，直到抗戰結束，又遷回武漢市。隨着新中國成立，編為武漢市第四中學。2009年恢復「博學」之名，與武漢市第四中學並用。

的懿訓女中聽一位神學院的牧師講道，他演講的題目是「否認There is no God」。哲理很深奧，我聽不懂，因此沒有引起我太大的注意。另一次是在漢口本校的禮拜堂，我純粹出於好奇參加了，但只想見識一下做禮拜的儀式和活動內容而已。

抗日戰爭時期，生活很艱苦，吃的是糙米飯，點的是桐油燈，一兩個星期才打一次「牙祭」。學習緊張而有規律，早上6點鐘起牀，10分鐘後就得洗漱完畢在操場集合做操，但學校的學習和生活氣氛仍然很濃厚和活潑。我們的校長胡儒珍博士，畢業於香港大學，稱得上是一位教育家。他不僅對學生在學習上的要求很嚴，而且要求品德、學習、文體全面發展。因此，學校經常開展文娛、體育等方面的活動。我在這些方面的受益也不淺，喜歡各種球類運動，尤其游泳一直是我的強項，至今我還非常愛好音樂和游泳活動。學校注重文體發展的傳統一直延續至今，聽說1995年全國第六屆中學生運動會就是在博學中學舉行的；2005年在世界中學生田徑錦標賽上，博學中學派出的女子團隊獲得女子團體冠軍的驕人成績。

重視英語教學，是教會學校的特點之一。不但英語由外國人教，物理、化學也是外國老師用英文講課。其他課程不及格可以補考，但英語不及格就得留級，因此，學校學英語的風氣特別濃厚，老師也很講究教學方法。我在漢口讀高一時，就上過三位老師講授的英語課：英國人白格里先生教文章，我還記得第一篇文章的題目是*Northstar*；他的太太英籍華人林明德老師教朗讀和會話；教務主任周鼎老師教文法，他那慈祥可親的面孔和誨人不倦的精神，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記憶中。在

那種幾乎是英文的環境中學英語，我當時達到了看英文電影百分之八九十都聽得懂的程度。我現在之所以能在頻繁的國際學術活動中運用英語進行交流，諸如學術討論會、合作研究、技術指導和宣讀論文等等，主要是母校給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當然，我母親對我的英語啟蒙也是很重要的，她畢業於教會學校，英文很好，對我的影響也是很大的。

後來可惜丟了，直到 1979 年才重新撿起來。要是不丟，我的英文會更好。現在學英文，學習語法很麻煩，我認為應該主要是 Practice，就是要“Speak English everyday, everytime, everywhere”。

回憶在博中的學生生活，至今印象深刻的還有幾件事：

其一，在重慶博中，早晨起牀後便在操場集合做早操。訓育主任胡必達老師總是在起牀鈴一響就馬上趕到學校宿舍查睡懶覺的，手裏拿着一根竹片，敲打那些還在睡覺的學生的鋪蓋，催促他們起牀。一天早上，幾個頑皮學生要捉弄胡老師，他們把幾個枕頭包在鋪蓋裏，假裝成一個學生在蒙頭睡懶覺。胡老師走進來，用力敲打那鋪蓋，但沒有反應，掀開一看，才知道上了當。此時，學生既高興又恐懼，不敢出聲，生怕老師追究而受處分，但胡老師並不在意，只是笑了一下，於是大家才哄堂大笑。

其二，我的班主任老師王育之是語文老師，四十七八歲，卻擁有一副老者模樣，尤其他給我們教古文的時候，就像私塾先生的樣子，搖頭晃腦地講課，十分有趣。有同學會故意去逗樂，問他：「這個東西英文怎麼說？」他就會笑着敲同學的「栗

殼」（腦殼），說道：「你曉得我不懂英語，還用英語來考我！」從中可看到師生間其樂融融。

其三，1946 年秋，大概是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給學校送來一批所謂救濟物品，都是一些破舊的衣服和鞋襪。其中有不少是婦女穿的（當時博中是男校），同學們對此很反感和氣憤。某天做晨操時，很多同學穿上高跟鞋、女式花衣和裙子，扮成各種怪模怪樣和做出各種怪動作，大家啼笑皆非。隨後同學們就把這些東西付之一炬，以示抗議。

其四，1947 年 6 月，湖北省舉辦全省體育運動會，學校挑選了十幾名體格魁梧的同學參加漢口的游泳選拔賽。我非常喜愛游泳，便向體育老師周慶宣報名，要求參加預選。他朝我打量了一番後，搖頭說：「你個子太小，體力不行！」次日早晨，周老師帶隊在前，10 多個身材高大的學生每人騎上一部自行車，一字長蛇地奔向市內某游泳池。我偷偷跳上了最後一名同學的單車後架跟了去。待到達預賽場時，周老師發現了我，便笑着說：「你既然來了，就試試看吧！」結果，出乎大家的意料，我本人也有想到，我竟在漢口的預選賽中獲 100 米和 400 米自由式兩個第一名，而其他同學，甚至國民黨空軍裏的彪形大漢都名落孫山。從此，體育老師就對我刮目相看。

不久，我便在省運會中取得兩塊游泳銀牌，為學校增添了光彩。我們博中的選手回校時，受到熱烈歡迎。同學們在校門口把我抬起來，往上使勁地拋了多次。

這就是我的母校博學中學，一所注重全面發展的中學，既重視教學質量和品德教育，也十分注重文體發展。我讀書的時

候，老師們經常帶領學生們開展各種文體活動，使我受益匪淺。我多次回到母校去探望，重溫少年時的記憶，那在操場上踢足球的印象還不時閃現在眼前，起腳一踢，仍然十分快意！

我在學習方面喜歡憑興趣，從小學到中學直到大學都是這樣：對喜歡的功課，就特別注意聽講，還讀這方面的參考書，成績就很好；不喜歡的，就考 60 分，只求及格就行。我喜歡地理、外文，化學我也喜歡，我考試就拿高分。我最不喜歡數學，得 60 分就心滿意足。記得當時學「負乘負得正」時，我很不理解，說正數乘以正數得到的是正數，這還好理解，為什麼負數乘以負數也得正？我就問老師為什麼，老師不講，只要我呆記。我不懂，那怎麼呆記呢？要講道理呀！從此我便對數學不感興趣了。什麼 \sin 、 \cos ，背幾個公式，什麼 $\sin A$ divided by $\cos A$ 等於 $\tan A$ ，哎呀，真是乏味，讓我頭疼，一點意思沒有。後來學幾何、三角，老師說世界三大難題中，有一個叫做直角不能三等分。我覺得 90 度的角，分成每個 30 度，怎麼不能三等分？他也沒講道理，我於是覺得這個數學沒有搞頭，從此就對數學更不感興趣了。第二個原因，數學題難，晚自習條件差，有時一個晚上一個題目也解不出來。

再說學語文吧。那是剛進贛江中學讀初中時，有一次語文老師佈置寫作文，我在作文中使用了「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的描寫，老師說這是臭文章。從此，我就不用「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這樣的詞彙了，再也不愛使用浮華的形容詞了。

我是個愛把事琢磨透的人，上初中的時候，我在課堂上就喜歡向老師提問題。記得有一次上物理課，老師講著名的愛因

斯坦的質能方程式 $E=mc^2$ ，我就想弄個究竟，為此費了不少腦筋，花了很多時間。現在來看，這個最簡單的方程式說明了最深奧的問題。

回想起來，我的求學時代是處在一個動盪的時代中。從初一到高二在博中學習，經歷了從重慶到武漢的時期；高二以後，由於父親調到了南京，在國民政府的僑務委員會做事務科的科長，全家也跟着到南京，我因此進到南京中央大學附中，繼續唸完了高中。1949 年 4 月，南京解放前夕，我和大哥當時是坐的最後一趟火車離開南京，然後舉家又到了重慶。

我考大學的時候，大半壁江山已經是共產黨的天下，全國大部分地方都解放了。國民黨政府管轄之下的大學已經沒剩下幾所了，只是在四川還有幾所大學。我是 1949 年 9 月上旬進大學的。當時我知道重慶北碚有一所與復旦大學有淵源關係的相輝學院，於是我選擇了進相輝學院，選擇農業是第一志願。學農還有個好處，它的數學少，只要搞方差分析，說是統計方面有一點數學，其他沒有。那時沒有計算器，都用筆算或是算盤打，討厭死了，都是些數字。

我之所以選擇學農，其實緣於從小產生的志趣。那是在漢口扶輪小學讀一年級的時候，老師帶我們去郊遊，參觀一個資本家的園藝場。那個園藝場辦得很好，到那裏一看，花好多，各式各樣的，非常美，在地下像毯子一樣。那個紅紅的桃子結得滿滿地掛在樹上，葡萄一串一串水靈靈的……當時，美國的黑白電影《摩登時代》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影片是卓別林演的。其中有一個鏡頭，窗子外邊就是水果什麼的，伸手摘